

差异、边界与资格： 职业信任的三重关系机制

李蔓莉 李 骏

摘要 公众对职业群体及其所生产专业知识的信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职业与外部世界关联的增加，因经典职业“封闭性”特征所构筑的信任体系面临动摇，职业社会学呈现出“关系”视角转向，由此，可提出影响公众职业信任的三重关系机制：职业与职业系统的关系、职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职业与国家的关系。结合 2022 年《职业分类大典》和腾讯词向量数据，测量公众对各类职业在专业技术层面的信任程度，探讨职业网络结构、职业公共性及中国特色职业管理制度对职业信任的影响，发现：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管辖任务的相似度与职业技术信任呈现“倒 U 型”关系；在知识生产边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独立于客户、对应专业知识越抽象的职业群体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对职业信任的“制度主义”解释路径进行了本土化回应：区别于英美国家的“协会性职业主义”，中国通过高质量的人才评价制度控制职业准入门槛，对公众的职业技术信任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职业信任 关系机制 本土化 最佳差异理论 人才评价制度

作者李蔓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0-0132-12

一、引言：职业权威的合法性危机

职业信任是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类型^①，当代社会信任依托于以专业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专家系统”和“符号系统”，以此帮助个体维持本体性安全^②，这有助于社会系统的整合并降低社会复杂性。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化，这促进了新职业序列的不断涌现。^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④ 而人才战略的落地依赖于国家对职业群体的评价与激励，以此建立职业群体的专业权威，进而促进公众对职业群体的认同。这意味着，与英美国家基于资格协会的市场化职业体系不同^⑤，中国的职业体系受到国家的深度干预，本文以此探讨中国公众职业信任形成的本土化路径：基于国家对各类职业“管辖权”的划分和中国特色人才评价体系。

① 郑也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4 期。

② 吉登斯·安东尼：《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

③ 刘思达：《新发展格局下的当代中国职业研究——从劳动分工到专业技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④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网站链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8/content_6968537.htm。（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5 日）

⑤ Young S. D., *The Rule of Experts: Occupational Licenscing in America*, Cato Institute, 1987.

当前职业/专业群体及其生产的专业知识正面临着公众信任危机。这包括，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对专家言论的“信息厌倦”^①；“气候门”中，对气候变化科学家操纵数据的质疑^②；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怀疑，所引发的“反疫苗接种运动”^③。该类现象被称为“专业知识悖论”：即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家，但专家的可信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刻都低，依赖和不信任两种关系相辅相成。^④同时，信任危机并不仅限于科学领域，随着新社交媒体环境兴起^⑤，传统媒体失去了对象征性元资本的垄断，导致各种代表专业知识和技能控制权的职业群体信任问题屡屡浮现。那么，传统与新兴、专业技术和技能类职业在公众中的信任程度究竟如何？影响职业/专业群体信任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以揭示现实状况。

其中，职业群体对应专业知识生产边界的开放，被认为是职业信任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知识平等主义兴起，外行和专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专业知识生产日益变得“客户导向”，基于情感和经验的专业知识更能满足客户需求^⑥，这导致了职业权威与信任受到挑战。此外，当前知识生产空间展现出跨领域的网络特征^⑦，技术充当连接领域和塑造领域间动态变化的材料纽带，这意味着职业之间不仅仅存在基于业务“管辖权”的竞争，也存在依赖关系。职业与公众的链接导致职业权威丧失已成定论，而职业间的关系如何影响职业信任，则有待学者进行探讨和验证。

同时，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职业群体的信任。在英美国家，职业通过专业协会和同行评议实现自我调节。这也导致在英美职业社会学主流理论中，国家对职业生活的干预研究相对缺失。^⑧而在我国，职业体系主要由国家进行管控，“职业化”的整个生命周期，均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⑨国家不仅主导了职业体系的生成，也构建了公众对职业的信任。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中国特色的职业管理体制，从职业社会学本土化研究角度，考察职业资格制度在构建公众职业信任中的关键作用。

根据上述理论导向与现实驱动，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层次聚类后的704个职业，利用腾讯词向量数据，测量中国公众对各种职业的技术信任。职业群体与外界交互的增加，被认为是影响职业及其专业知识权威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国家通过职业认证与执照等制度性封闭策略，确保从业者具备合格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市场失灵对公众权益造成风险，以此塑造稳定的公众信任。本文延续经典职业社会学的综合方法论，考察职业之间、职业与公众以及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职业信任的影响。

二、从“封闭性”到“连接性”：迈向关系型职业主义的分析视角

（一）职业信任及其传统研究视角

职业信任是指社会对特定职业群体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伦理操守方面的信任态度。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公众对职业群体的信任赋予其在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职业特征表现为对社会公众的“认知权威”，职业系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职业群体也依赖于客户的信任，基于专业素养与社会进行“讨价还价”，以此实现职业群体的集体流动。^⑩综合学者对职业的定义，职业的自我监管应建立在专业技能、对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和道德准则基础之上^⑪，因此，职业信任可二分为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⑫。鉴于当下公

① 吕书鹏、高功成：《“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1期。

② Collins H., *Are we all scientific experts now?* John Wiley & Sons, 2014.

③ Goldenberg M. J., *Vaccine hesitancy: Public trust, expertise, and the war on scienc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21.

④ Eyal G., *The crisis of expertise*, John Wiley & Sons, 2019.

⑤ 朱博文、罗教讲：《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公众对医生的信任吗？——基于数据CSS2013的实证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⑥ Sheehan P., “The paradox of self-help expertise: How unemployed workers become professional career coach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7(4), 2022.

⑦ Eyal G., “For a sociology of expertise: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autism epi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4), 2013.

⑧ 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⑨ 孙一平：《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9期。

⑩ Rueschemeyer D., *Lawyers and their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Germany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⑪ 赵康：《专业化运动理论——人类社会中专业性职业发展历程的理论假设》，《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⑫ 牛冠朝、刘军强：《信与疑之间——民众对医生“反常”信任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姚泽麟：《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伦理：概念源流与中国现实》，《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

众对专业群体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在对其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能力的质疑，且国家的人才标准亦是依据职业群体的专业技术来设定门槛，因此，本文聚焦于分析公众对职业群体技术层面的信任程度，同时对公众职业道德信任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然而，当前职业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职业群体。例如，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研究发现患者信任主要来自对医疗制度的信任^①，此类研究多采取调查问卷或实验数据，测量个体对特定职业群体的信任。在职业社会学方法论层面，个案研究与综合方法（synthesis）并存；而在信任理论层面，信任通常建构为二分类别，包括人际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② 其中，制度信任包含公众对各类职业（如：警察、医生）的信任^③，且更适合使用综合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但国内职业社会学领域采用综合方法的研究尚显薄弱，事实上，许多经典的职业社会学研究采取综合方法，将职业系统——而非特定职业群体，作为分析单位。例如，“管辖权”理论阐释了不同职业对工作任务的争夺，而“序列分析”则归纳了职业流动的模式。^④ 本文以职业作为样本单位，将整合公众观念的大数据作为技术与道德信任的测量工具。并在下文阐释以封闭性为特征的职业信任，如何受到职业与外界“关系”链接转向的影响。

（二）职业研究的“关系”视角转向

职业化是职业建立合法性、获得公众信任的重要过程。该过程被视为一个连续谱系，一端体现出封闭性和保护性的特征，另一端则展现出开放性和连接性特征。传统上，职业化过程通过“保护屏障”将专业人士及其工作与外界隔离。“屏障”规定了需要保护的内容（如专业、工作和自主权）、保护方式（通过法律、文化和象征性技术）、保护的主体（如国家、大学和协会）以及保护的目的。这些因素共同维护了职业专业精神的核心维度：专业知识、自主性和权威。^⑤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保护性专业主义正逐渐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本质主义”的职业概念被打破，传统的保护屏障正在逐步瓦解。^⑥ 随着专业领域内部的异质性和碎片化加剧，专业人士已无法完全与外界隔离，职业逐渐被纳入更广泛的“关系”视角中。这包括与国家、社会（客户与公众）、高校以及职业之间的互动，既有研究虽已揭示出我国法律体系和医疗服务受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多重影响^⑦，但尚未深入探讨职业与外界“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公众对职业的技术信任。因此，本文将重点梳理并考察职业之间、职业与市场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公众职业信任的影响。

1. 职业间的相互关系。

当前，知识生产已超越了既有职业领域的“管辖边界”。研究者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场域理论相结合，认为行动者在多个领域中利用“工具和设备”影响专业知识生产方式，形成跨领域的“专业知识网络”。例如，在美国艾滋病研究中，参与相关知识生产的职业群体包括：免疫学家、病毒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等。^⑧ 针对劳动者个体而言，在后职业主义时代，职业边界变得更加无定形，多职业主义（Polyoccupationalism）趋势明显，劳动者通过建立跨越职业界限的“多重工作”，结合核心技能与边缘技能，获得“连字符”职业头衔，增加其专业技能的独特性。^⑨

① 池上新：《制度抑或文化：中国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2期；吕小康、王丛、汪新建：《多重不确定风险及其应对——儿童血液病病房中的医患信任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周扬：《工作流动轨迹与地位获得过程：一个序列分析模型研究》，《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Noordgraaf M., “Protective or connective professionalism? How connected professionals can (still) act as autonomous and authoritative experts,” *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 7(2), 2020.

⑥ 简逸伦、肖索未：《职业社会学的新发展：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⑦ 程金华、李学尧：《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姚泽麟：《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对公立医院医生执业行为的分析》，《社会》2017年第2期。

⑧ Epstein S., “The construction of lay expertise: AIDS activism and the forging of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linical trial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4), 1995.

⑨ Hénaut L., Lena J. C., Accominotti F., “Polyoccupationalism: Expertise stretch and status stretch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8, no. 5, 2023, pp. 872–900.

既有研究从知识生产、劳动者技能角度阐述了职业间存在互通的可能性，但尚未指出该网络具体的构建方式。本文认为既有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种视角：第一，多个职业群体参与某项专业知识的生产；第二，一个职业需要对应多种专业知识或技能。这是职业→专业知识与技能→业务对应关系的变化，即从较为严格的“一对一”关系，转向“一对多”“多对多”等关系。即，职业与对应专业知识/技能的关系可视为一个二模网络，该网络的节点（Node）是职业，两个职业对应专业知识与技能相似度则可以形成一条边（Tie）。例如，阿伯特指出：“有些事务和其他事务具有相似性，这些问题能够被想象为处在一个抽象空间中。”^① 转译为整体网络视角，职业可以根据对应任务、专业知识/技能的相似性构建网络。当前职业结构研究也开始将职业视为整体网络，认为职业通过劳动者的流动相互连接^②，而劳动者的流动则受到职业相似性的引导，执行相关任务或需要相似资质的职业形成联系。这再次论证了职业网络建立的本质是：处理任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相似性。

基于相似性的职业整体网络可以计算特定职业与其他职业间的差异，而职业信任作为社会观念，也应符合认知研究中的最佳差异性理论（Optimal Differentiation）假定^③，那些在相似性与差异性之间保持平衡的职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公众技术信任。技能泛化的职业与更多职业有业务上的重叠，也面临更激烈的“管辖权”之争，公众能够找到更多职业“替代品”，对职业专业性评价会降低，进而引发对这类职业的批判和指责；而与其他职业的相似度过低，工作业务内容过于边缘，所掌握的技能相对独立冷门，处理的业务类型与公众生活日常世界较为疏离，公众对这类职业处理的业务较为陌生，这也可能引发对职业专业技能的质疑。因此，与其他职业过高和过低的相似性都可能造成职业技术信任降低，故提出假设1。

假设1（职业最佳差异性假设）：职业与其他职业的相似性与技术信任呈现非线性关系，公众对中等相似性的职业技术信任最高。

2. 职业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职业与客户的互动关系。根据职业与客户的关系，职业可以分为依赖客户和独立于客户的两种类型。埃亚尔认为职业与公众的关系存在两难境地：过于依赖消费者会面临竞争、批判性评价和贬值；而过于独立则可能导致孤立和失去客户，形成“象牙塔现象”。^④ 在新自由主义和成本控制政策的背景下，职业的专业化呈现出客户导向和企业导向，与以职业封闭为中心的传统专业主义特征不同^⑤，这些职业接受了“基于市场的规范和做法”，进而导致专业人士的权威被客户日益增长的决策参与需求所削弱。职业与客户的关系则会影响公众对职业的信任，吉登斯指出，职业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是专业化形成的必要条件：隐藏后台专家之间的分歧、谈判和管辖权斗争，是前台形成客观共识的基础。^⑥ 他强调职业与外界“交汇口”的重要性，即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体系接触的地方，这也是公众对专业人士产生怀疑的原因，体现了抽象体系脆弱性的根源。^⑦ 总之，在一个客户话语权重增加的时代，需要与客户直接沟通的职业更易受到公众质疑，独立于客户运作的职业有更高的技术信任。故提出假设2.1。

假设2.1（职业公共性假设）独立于具体客户的职业，公众对其技术信任程度更高。

第二，职业对应专业知识类型。专业知识（Expertise）被视为职业的“最小公分母”^⑧，是职业研究的核心内容。职业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垄断控制来巩固其权威，要求从业者通过认证程序来证明其资格。“抽象是管

①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② Lin K. H., Hung K.,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occupations: fragmen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ag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7(5), 2022; Cheng S., Park B., “Flows and boundaries: A network approach to studying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6(3), 2020.

③ Askin N., Mauskapf M., “What makes popular culture popular? Product features and optimal differentiation in music,”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2, no. 5, 2017.

④ Eyal G., “For a sociology of expertise: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autism epi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4), 2013.

⑤ Kirkpatrick I., Muzio D., Kipping M., et al., “Organizational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management consultancy in the UK,” *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 10(3), 2023.

⑥ Bijker, Wiebe, Roland Bal, and Ruud Hendriks, *The Paradox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The Role of Scientific Advice in Democraci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

⑦ 吉登斯·安东尼：《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

⑧ Freidson E.,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辖权斗争中更有力的武器”^①，抽象知识的缺失则会导致职业的衰亡。而专家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来维持这种垄断，决定谁可以进入专业领域并参与政策制定。^② 在早期，专业知识“必须足够正式、规范和标准化”，不能由个人任意“修正”，并被社会视为相应知识领域中唯一合法的权威。^③ 而知识社会的兴起引发了专业知识的扩散，普通人和“外行专家”（Lay expert）越来越多地参与专业知识的生产。专业知识不再仅基于专业认证，也可以通过经验积累和社会运动等方式获得合法性，“公民科学”被视为新的知识生产方式。^④ 由此，专业知识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实质性、抽象性的专业知识与情境性、关系性专业知识并存，前者相对客观、不受环境影响；后者更强调在实践情境中与从业者的知识互构^⑤，非专业人士更易参与替代性的知识生产，导致职业权威受到挑战。例如，随着替代医学的崛起以及公众对自然疗法的认同，导致传统医学专业精神受到侵蚀。综合上述研究，在专业知识生产权力下沉的时代，职业对应的专业知识越客观抽象，公众无法参与替代性的知识生产，则能够保持公众对其的技术信任。故提出假设 2.2。

假设 2.2（专业知识替代性假设）：职业对应专业知识的抽象程度越高，公众对其技术信任程度更高。

3. 职业与国家的关系。

职业与国家关系的定型与国家理性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职业化进程早于国家理性化，职业通常享有更高的自主性^⑥；反之，国家则对职业拥有更强的控制力。在我国，国家对职业的控制早于职业自主发展^⑦，职业化进程与“人才评价制度”紧密结合。定量研究的本土化需要考虑不同社会和群体的独特文化背景^⑧，与英美国家由职业资格协会（Qualifying Associations）颁发证书的协会性职业主义（Associational Professionalism）不同，我国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和调整的职业资格制度、职称制度和职业技能标准。因此，中国职业体系的封闭性过程主要由国家完成，职业封闭性理论认为，职业化是职业群体通过封闭策略，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庇护所”。^⑨ 其中职业执照许可是这种封闭策略的典型形式，即国家授权特定人员合法从事某一职业^⑩，赋予职业排他性的法律地位，保护职业群体的市场份额与收益^⑪。基于中国特色的职业管理制度，职业执照许可对应概念为“准人类职业资格”；我国还通过“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能力进行等级评定。总之，职业封闭性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手段，通过确保从业者获得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合法性，从而构建公众对该职业的信任。故提出假设 3。

假设 3：（职业制度性封闭假设）由国家筛选赋予人才评价制度通道的职业，公众对其技术信任程度更高。

三、研究数据、变量与模型

由于本文数据来源于多项数据集，为便于将研究变量、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进行对应，如图 1 所示，本文以变量测量与建构方式为呈现逻辑，并在后文细述相应数据来源与变量操作化理由。

①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

② Gieryn T. F.,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6, 1983.

③ Croidieu G., Kim P. H., “Labor of love: Amateurs and lay-expertise legitimization in the early US radio fiel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3 (1), 2018.

④ 陆群峰：《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 年第 5 期。

⑤ Sandefur R. L., “Elements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Understanding relational and substantive expertise through lawyers’ impa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5), 2015.

⑥ 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⑦ 郑广怀、王晔安、马铭子：《“以红领专”：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的领导权建构》，《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⑧ 谢宇：《社会学本土化与定量研究的再思考》，《学术月刊》2024 年第 3 期。

⑨ Larson M. S., “Professionalism: Rise and fal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9(4), 1979.

⑩ Meuris J., Merluzzi J., “A Hidden Barrier to Diversification? Performance Recognition Penalties for Incumbent Workers in 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9(2), 2024.

⑪ Haupt A., “Who profits from occupational licens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8(6),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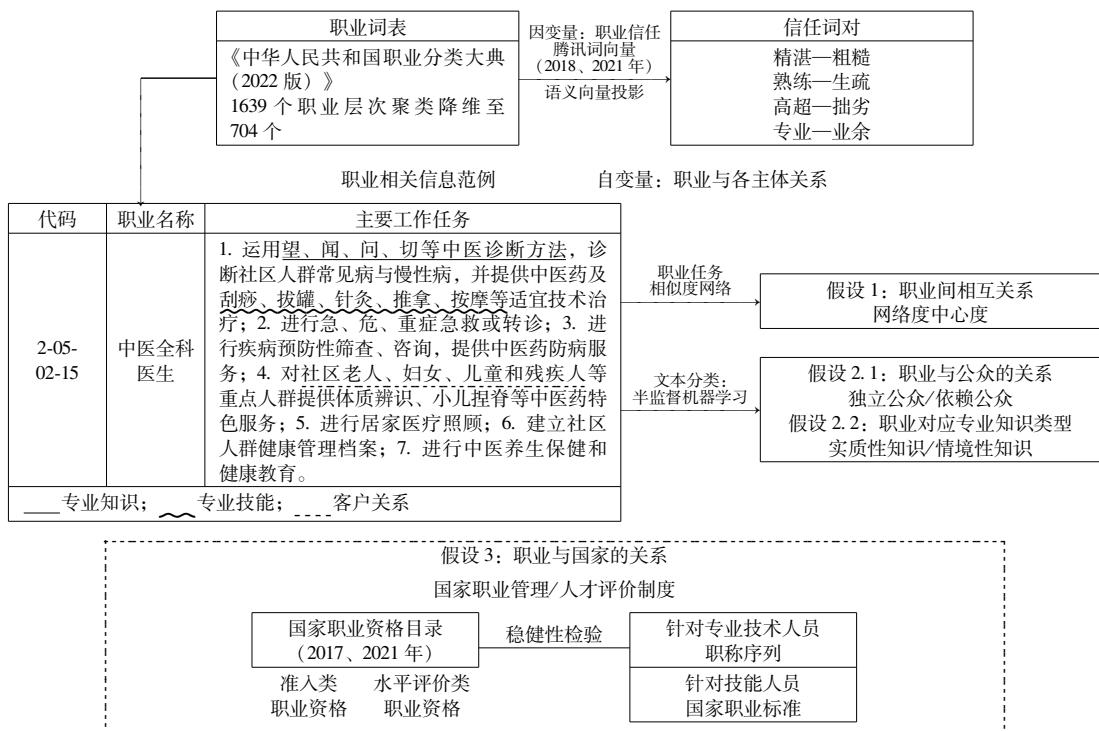


图1 职业信任的三重关系机制及变量数据来源和建构方法

(一)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公众对职业的技术信任。本文则基于词向量中语义方向投影的方法，计算职业的技术信任。使用词向量分析公众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社会学基础。群体的语言反映了其文化体系，通过分析词汇间的语义关系，进而反映文本生产主体（如：政府）的实践逻辑。^①通过词向量相关性测试（WEAT）和心理学的隐式关联测试（IAT）及实际社会调查数据对比，词向量与真实观念存在高度相关性。^②故而，词向量被用于各类公众观念的研究。例如，通过Google-ngram语料库呈现美国社会中职业、音乐流派和政治态度在性别、阶层和种族维度中的分布。^③

进而，考察词向量用于构建和测量公众职业信任的方法适用性。首先，本文所探讨的职业信任属于公众对抽象系统的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适合进行跨国跨领域对比研究^④。本文认为职业本身蕴含了区别于个体文化的外部公共文化意涵，反映出公共领域中的定型观念，例如“专家信任危机”，即为一种流传于公共领域的专业人士刻板印象。^⑤其次，“信任”可以通过一组反义词汇进行界定。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神话和故事通过二元对立（如神圣与世俗等）构建文化意义，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本文则通过相应的二元反义词对，以一组锚定词定义两极，构建“信任—不信任”的语义维度，从而将不同职业投射到语义方向向量上，精确测量职业在信任连续统上的位置。本文对职业信任的测量包括如下两个步骤：

第一，职业的选择。本文的职业名词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职业分类大典》的职业分为8个大类^⑥，编码为四个层级。由于已有文献和国内权威数

① 刘河庆、梁玉成：《政策内容再生产的影响机制——基于涉农政策文本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Ascoli R., Giabelli A., Malandri L., et al., “A fistful of vectors: a tool for intrinsic evaluation of word embeddings,” *Cognitive Computation*, 16(3), 2024.

③ Kozlowski A. C., Taddy M., Evans J. A., “The geometry of culture: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class through word embedd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5), 2019.

④ Bjørnskov C., “Social Trust and Fractionalization: A Possible Reinterpret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no. 3, 2008.

⑤ Eyal G., *The crisis of expertise*, John Wiley & Sons, 2019.

⑥ 基于第一大类（各机关单位负责人）和第七大类（军队人员）职业的特殊性，本文并未选择考察这两类职业，八大类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故也不纳入。

据库中，职业研究至多细分到第三层小类，以此与国际标准职业编码（ISCO）相匹配。因此，本文通过层次聚类对职业进行降维处理，将第三层职业内部相似度高的职业进行归并。^① 同时，考虑到职业名称的专业性较强，而语料库生产于日常生活场景，因此本文对职业名称进行口语化转译，以便与词向量数据中的词汇相对应。

第二，职业信任的建构。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方法，计算公众对每种职业的技术信任。数据来源于腾讯 AI Lab 开发并开源的大规模 2018、2021 年词向量数据（目前仅发布了这两期数据），包含了 800 多万中文词汇（200 维词向量），利用腾讯公司庞大的用户数据和丰富的文本资源训练而成，语料来源基于社会日常互动、论坛与非官方媒体新闻。^② 腾讯词向量的构建采用了 DSG 算法（Directional Skip-Gram），通过学习词序信息，增强了模型对未见过的词序或句子结构的泛化能力。^③ 本文将聚类后能与 2021 年腾讯词向量相对应的 704 个职业词汇（2018 年能够对应的职业为 552 个）纳入考察范畴。

由此，本文根据既有文献对职业信任的锚定词进行筛选。已有研究发现，信任判断基于对方的能力、善意和诚信的感知^④；针对医生信任的维度包括：尽责、技能、诚实、机密和整体信任^⑤。同时，本文参考了疾病污名化的变量操作方法。^⑥ 根据既有文献与将技术信任语义向量量表设定为：精湛—粗糙、熟练—生疏、高超—拙劣、专业—业余。职业信任具体建构分为三个步骤^⑦：首先，计算目标词词向量： $\vec{职业}_i$ 。计算语义方向向量：假设方向向量为 $\vec{V}_{信任}$ ，该向量由两个锚定词的向量差值计算，方向向量可以表示为： $\vec{V}_{信任} = \vec{专业} - \vec{业余}$ 。计算投影目标词在语义方向的投影， $\vec{职业}_i \cdot \vec{V}_{信任}$ 是目标词向量与语义方向向量的点积； $\|\vec{V}_{信任}\|$ 是语义方向向量的长度，针对职业_i的信任可表示为：

$$\text{职业信任}_i = \frac{\vec{职业}_i \cdot \vec{V}_{信任}}{\|\vec{V}_{信任}\|} \quad (1)$$

最后，本文评估了职业技术信任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使用了克朗巴赫的 α 系数和折半信度作为衡量标准。2018 年和 2021 年技术信任的两种系数分别为 0.780、0.725、0.790 和 0.758，说明这四个维度测量技术信任的稳定性较高。

（二）自变量

1. 职业间的相互关系。

基于《职业分类大典》中对职业定义和主要工作任务的描述，通过计算职业间的平均成对余弦相似性，构建职业任务相似度网络：职业为节点，相似度超过 0.45 的职业间则形成一条边。已有研究发现通过任务描述计算职业名称的内部相似性，可判断职业任务复杂性^⑧，本文认为“主要工作任务”与职业“管辖权”概念相类似，每个职业都通过管辖权纽带与一套业务（Task）紧密联系。^⑨ 当前基于职业任务内容分析技术进步，是考察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重要视角^⑩。本文仅关注职业间“管辖权”的相似度，因此只考察职业的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计算方式为： $Cd(Ni) = \sum_{j=1}^n X_{ij} (i \neq j)$ 。度中心度数值越高，意味着与该职

① 聚类方法：对职业文本向量化后，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动态确定簇数，确保在 1 到 5 个之间，计算每个簇的中心点，并选择离中心点最近的职业为代表性职业。

② 语料库包括社交媒体平台（QQ 和微信用户生成内容）、腾讯新闻和腾讯网的新闻文章、在线论坛和社区讨论、阅文集团的电子书籍和文学作品、搜狗百科等知识库信息、腾讯视频和音乐等平台的文本信息。这些词语能够反映中文语境的语言使用模式和语义关系，进而能够呈现真实的观念关系结构。

③ 数据来源：<https://ai.tencent.com/ailab/nlp/en/embedding.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0 日。

④ Mayer R. C.,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0, no. 3, 1995.

⑤ Hall M. A., "Researching medical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vol. 20, no. 5, 2006.

⑥ Best R. K., Arseniev-Koehler A., "The stigma of diseases: unequal burden, uneven decl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8, no. 5, 2023.

⑦ Stoltz et al., 2023.

⑧ Martin-Caughey A., "What's in an Occupation? Investigating Within-Occupation Variation and Gender Segregation Using Job Titles and Task Descrip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6, no. 5, 2021.

⑨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

⑩ 王永钦、董雯：《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

业“管辖权”相似的职业越多。职业网络构建范例如图 2，在左图中与节点 1 相连节点为 5 个，意味着度中心度最高；具体到本文的职业整体网络图，与外科医师相连的医师数量最多（9 个），说明该职业与妇产科、皮肤科、肿瘤科等医师类别存在任务关联，与其他职业的相似度较高。而内科、儿科医师与其他医师的相似度较低。根据本文建构的职业网络，度中心度较低的三个职业分别是：考古探掘工、邮件分拣员和电影洗印员；度中心度较高的三个职业是：设备工程技术人员、机械设备安装工和设备点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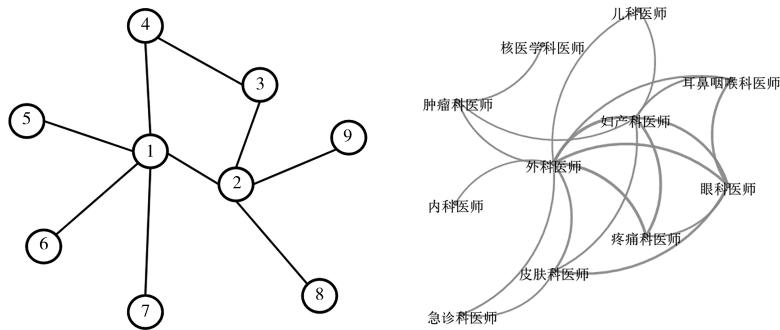


图 2 根据职业主要工作任务构建的职业网络示意图

2. 职业与市场的关系。

包括两个变量：职业与具体客户的关系和职业对应专业知识类型。首先，《职业分类大典》针对职业工作任务中，已阐明职业是否有具体的服务对象。任务描述中“客户”“消费者”等词汇，说明该职业存在与公众的“交汇口”。例如，兽医师与宠物医师虽属于同一小类，工作任务高度相似，但宠物医师需要与相关客户互动。同理，《职业分类大典》描述了职业对应的专业知识内容，实质性的专业知识与“模型”“原理”“概念”“定律”等词汇相关，例如，精算专业人员与保险核保专业人员，前者需要根据统计信息（死亡率、疾病发生率）设计、估算和评价保险，后者侧重于收集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给出风险评估意见。本文通过有监督机器学习^①，针对职业工作任务文本进行分类，将独立于具体客户的职业赋值为 1，依赖具体客户的职业赋值为 0；将对应实质性和抽象性的专业知识的职业赋值为 1，偏向情境性和关系性的专业知识赋值为 0。

3. 职业与国家的关系。

本文将职业的制度性封闭程度，操作化为国家是否对职业进行职业化管控，即中国特色的人才评价制度：职业资格制度、职称制度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资格证书包括两类^②：准入类职业资格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赋值为 1，未纳入目录赋值为 0。^③

（三）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职业的其他重要特征，这些变量可能会导致对核心自变量的干扰。客观变量包括：职业所对应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对专业人士的信任与各种知识和能力密切相关^④。由于国内尚未建立职业数据库，参考既有研究使用美国职业数据 O * NET 替代职业数据^⑤，根据美国职业编码任务描述与中国职业“主要工作任务”，计算两者最接近的文本相似度，以此将职业编码进行匹配。本文使用腾讯词向量，补充计算职业在其他重要语义维度的投影。包括：性别维度投影值（ $\overrightarrow{\text{男性}} - \overrightarrow{\text{女性}}$ ）、年龄维度投影值（ $\overrightarrow{\text{青年}} - \overrightarrow{\text{老年}}$ ）、教育维度投影值（ $\overrightarrow{\text{博士}} - \overrightarrow{\text{文盲}}$ ）和收入维度投影值（ $\overrightarrow{\text{高薪}} - \overrightarrow{\text{低薪}}$ ）；同时，研究还纳入了《职业分类大典》中

① 本文使用的有监督机器学习方法是支持向量机（SVM），适用于二分类问题。数据集按比例分为训练集（80%）和测试集（20%），并使用 TF-IDF 进行文本特征提取。SVM 通过最大化类别间隔寻找最优超平面，模型采用网格搜索和交叉验证调优超参数，并在测试集上评估其准确率、精确率和召回率，以确保文本分类的性能稳定。

②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人事考试中心组织相关考试并颁发两类证书。

③ 在职业匹配的操作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与职业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例如，法律从业人员均能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涵盖了律师（2-07-04-00）、法官（2-07-02-00）和检察官（2-07-03-00）等职业，本文通过构建关键词序的方式进行匹配，并在匹配后由人工再次检查。

④ Svensson L G., “New Professionalism, Trust and Competence: Some Conceptual Remarks and Empirical Data,” *Current Sociology*, vol. 54, no. 4, 2006.

⑤ 张咏雪：《从自动化技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影响的技能异质性研究》，《社会学研究》2024 年第 4 期。

的对职业的既有分类。

(四) 研究模型

本文因变量包含两期数据, 研究使用线性混合效应回归进行拟合。线性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允许研究者同时建模个体层面的变化(随机效应)和总体趋势(固定效应), 尤其适用于数据点具有嵌套结构或是重复测量的情境^①, 并通过引入随机效应来捕捉个体差异。本文的自变量包含时变变量(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和非时变变量(职业网络度中心度、职业公共性和专业知识类型等), 因此适合使用该方法。如公式(2)所示, y_{ij} 代表职业 j 在时间点 i 时公众的职业信任, x_{1ij} 到 x_{fij} 为自变量, ζ_j 为随机截距, ϵ_{ij} 为职业 j 在时间点 i 的随机误差项。

$$y_{ij} = \beta_0 + \beta_1 x_{1ij} + \cdots + \beta_f x_{fij} + \zeta_j + \epsilon_{ij} \quad (2)$$

四、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分析

如表 1a—1b 所示, 本文因变量为技术信任, 该变量的均值从 2018 年的 0.258 增加到 2021 年的 0.272, 这表明人们对职业技术的整体信任程度有所提高。此外, 教育维度和收入维度投影值也显示出显著变化, 差异分别为 0.200 ($p < 0.01$) 和 0.107 ($p < 0.01$), 说明我国职业的社会声望整体下降, 但与职业相关的性别和年龄维度则相对稳定。针对非时变变量, 职业的网络度中心度平均为 0.117, 大多数职业的度中心度集中在 0 到 0.1 之间, 职业网络中与其他职业相似度高的职业较少。在公众关系方面, 独立于公众的职业比例为 68.89%; 在职业所对应的专业知识类型中, 情境性知识占 51.11%, 实质性知识占 48.89%, 两者分布较为均衡。针对专业技术人员, 有职称序列的职业占 38.87%; 针对技能人员, 有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占 56.52%; 在职业类型中,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最高(39.31%)。

表 1a 时变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时变变量	2018 年	2021 年	差异及检验
技术信任	0.258 (0.008)	0.272 (0.008)	0.013 (0.011)
准入类职业资格	0.166 (0.016)	0.144 (0.013)	-0.022 (0.020)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0.122 (0.014)	0.109 (0.012)	-0.013 (0.018)
性别维度投影值	0.250 (0.017)	0.269 (0.012)	0.018 (0.020)
年龄维度投影值	-0.056 (0.017)	-0.083 (0.013)	-0.026 (0.021)
教育维度投影值	0.590 (0.017)	0.390 (0.013)	-0.200 *** (0.021)
收入维度投影值	0.099 (0.012)	-0.009 (0.013)	-0.107 *** (0.018)
样本量	552	704	

注: (1) ***、**、*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3) “所需知识水平”到“所需教育水平”均来自 O*NET 数据, 已对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1b 非时变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非时变变量	2018 年	2021 年	差异及检验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	0.117 (0.092)	0.117 (0.092)	0.000 (0.000)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平方项	0.022 (0.034)	0.022 (0.034)	0.000 (0.000)
所需知识水平	7.502 (2.516)	7.502 (2.516)	0.000 (0.000)
所需技能水平	9.527 (2.651)	9.527 (2.651)	0.000 (0.000)
所需能力水平	13.687 (2.353)	13.687 (2.353)	0.000 (0.000)
所需教育水平	4.128 (2.346)	4.128 (2.346)	0.000 (0.000)
公众关系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依赖公众	31.11%	31.11%	31.11%
独立公众	68.89%	68.89%	68.89%
专业知识类型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情境性知识	51.11%	51.11%	51.11%
实质性知识	48.89%	48.89%	48.89%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无标准	43.48%	43.48%	43.48%
有标准	56.52%	56.52%	56.52%
职称序列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无职称序列	61.13%	61.13%	61.13%
有职称序列	38.87%	38.87%	38.87%
职业类型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专业技术人员	39.31%	39.31%	39.31%
办事人员	3.47%	3.47%	3.47%
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	30.83%	30.83%	30.83%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2.22%	2.22%	2.22%
农、林、牧、渔业人员	24.17%	24.17%	24.17%

注: 同表 1a。

① Baayen R. H., Davidson D. J., Bates D. M., “Mixed-effects modeling with crossed random effects for subjects and item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vol. 59, no. 4, 2008.

研究还发现，职业技术信任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公众对男性从业者较多的职业具有显著更高的技术信任度，相关系数为 0.152 ($p<0.001$)；对于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薪酬水平更高的职业，公众对其技术信任度也更高，相关系数分别为 0.252 ($p<0.001$) 和 0.513 ($p<0.001$)。公众对工作资历要求较高的职业技术信任度更高，但年龄与技术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 -0.030 ($p=0.285$)。

（二）基准模型

如表 2 所示，模型 1 至模型 4 的因变量为技术信任，自变量根据假设的顺序依次纳入模型。模型 1 显示职业网络度中心度及其二次项均显著，系数分别为 0.881 ($p<0.001$) 和 -1.300 ($p<0.05$)，即职业网络度中心度与技术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随着职业网络度中心度的增加，技术信任水平在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拐点为 $0.339 [=0.881/(2\times1.300)]$ 。这意味着与其他职业相似度太低，职业对应专业知识与技能相对边缘化，导致公众对其技术信任较低；反之，如果与其他职业相似度太高，被替代的可能性也更高，这也会导致相对负面的技术信任，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

在模型 2 中，职业与公众的关系和专业知识类型对技术信任的影响也显著，系数分别为 0.027 ($p<0.1$) 和 0.048 ($p<0.001$)。独立于公众、生产实质性专业知识的职业，抽象知识所铸造的“高墙”保护着职业，公众因为难以质疑和动摇职业合法性，对该类职业仍保持较高的技术信任，本文的假设 2.1 和 2.2 得到验证。

国内职业资格目录分为两类：准入类职业资格与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前者是针对取得行政许可、有执业门槛的职业资格；后者是社会通用性强的非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制度。^① 考虑到两种证书目录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 VIF 系数均低于 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模型 3 中，本文同时纳入两种证书目录变量，可发现，准入类职业资格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对公众技术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 0.038 ($p<0.1$) 和 0.058 ($p<0.05$)。这表明国家通过对部分职业的制度性封闭策略，可以对职业群体进行保护和赋权^②，有效保障该类职业内部的技术准入标准，公众也认可国家授予职业的专业地位，对此类职业持有较高的技术信任。因此，假设 3 得到验证。模型 4 则纳入了研究假设中的所有变量，各变量的系数方向与显著度均没有较大的变化。

表 2 职业特征对公众职业技术信任的影响^③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	0.881 *** (0.229)			0.770 *** (0.235)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平方项	-1.300 ** (0.603)			-1.003 * (0.608)
公众关系（独立客户=1）		0.027 * (0.015)		0.031 ** (0.015)
专业知识类型（实质性知识=1）		0.048 *** (0.014)		0.033 ** (0.014)
准入类职业资格（纳入目录=1）			0.038 * (0.020)	0.046 ** (0.020)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目录=1）			0.058 ** (0.025)	0.043 * (0.02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256	1256	1256	1256
组数	704	704	704	704

注：(1) ***、**、*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自变量（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改变模型（OLS 回归）和分组回归，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我国人才管理对象分为两个类别：专业技术人员与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① 鲍静、邱茜、谢晶：《中国职业资格制度：历程、现状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2023 年第 12 期。

② Weeden, Kim A., “Why do some occupations pay more than others? Social clos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8, no. 1, 2002, pp. 55–101.

③ 本文也分析了职业特征对道德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网络度中心度与道德信任呈现“U 型”关系，独立于客户的职业道德信任较高，但专业知识和职业资格对道德信任的影响不显著，道德信任主要受到国家官方舆论的影响（《人民日报》对于职业“楷模化”的塑造）。限于篇幅，并未展示全部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如:医生、教师和律师等职业;而技能人员则主要在生产和服务等领域的岗位一线工作,如:秘书、快递员和导游等职业。国家对这两类职业群体的技术控制模式还存在差别:职称制度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评价的重要制度^①;职业技能标准是针对技能类职业进行评价和分级的基础。

因此,本文通过分别对两个群体构建模型,并将国家的制度性封闭措施分别操作化为职称序列和国家技能标准,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两个模型的 R^2 分别为 0.374 和 0.474,这说明自变量对技术信任的解释程度较高。首先,公众对被纳入职称序列的专业技术类职业信任程度更高,系数为 0.058 ($p<0.001$);公众对有国家技能标准的技能类职业信任程度也较高,系数为 0.036 ($p<0.001$),这均说明国家管控对于职业技术信任的“信号”作用强烈。职业网络度中心度的平方项与基准模型方向一致但不显著,说明此类职业的差异化与职业信任呈现线性关系,职业对应知识与技能越泛化,管辖的工作任务越多元,公众对该类职业的技术信任越高;而技能类职业仍然符合职业相似度的最佳差异规律;职业与公众的关系、专业知识类型对于两类职业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均与基准模型差距较小。因此,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 影响公众职业技术信任的分组回归模型

	专业技术类职业技术信任	技能类职业技术信任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	0.413 * (0.223)	0.938 *** (0.224)
职业网络度中心度平方项	-0.254 (0.590)	-1.334 ** (0.600)
公众关系 (独立于公众=1)	0.027 ** (0.014)	0.095 *** (0.014)
专业知识类型 (实质性专业知识=1)	0.050 *** (0.014)	0.024 * (0.013)
职称序列 (有序列=1)	0.058 *** (0.014)	
国家职业标准 (有标准=1)		0.036 *** (0.01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523	733
R^2	0.374	0.474

注: (1) ***、**、*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开放边界时代的职业信任问题

本文关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职业信任式微现象。作为“反思性的现代性”的必然趋势^②,现代社会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启蒙,导致了专业知识生产边界的开放。“新专业主义”^③呈现出与传统职业特征的差异,即职业不再广泛享有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核心原因在于职业不再是一个固定和封闭的实体,职业概念变得关系性和过程性,专业行动对外部世界产生依赖,这被称之为“链接性专业主义”(Connective professionalism)^④。本文基于这样的职业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通过分析职业间的关系、职业与公众的关系,以及职业与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公众职业技术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本文以《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为研究单位,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建构研究变量。相对于微观调查数据,能够描绘中国公众对职业系统的整体信任图景。研究使用来源于中国社会日常互动场景的词向量数据,构建公众对职业的技术信任。发现职业网络度中心度与技术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这论证了职业间的最佳差异化假设,当相似度过低或过高时,职业存在技能边缘化或高替代性风险。进而,与客户关联度更高、外行专家更容易参与知识生产的职业,专业人士的“认知优越性”(Normative Superiority)更可能遭受破坏,与客户没有直接的“交汇点”、生产实质性专业知识的职业,能够在职业与外界的开放性趋势下,维系公众对职业的信任。而国家对于职业专业性的保护作用依然明显,通过统一的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职业群体有权力使用国家认可的质量信号,中国政府主导的人才评价制度深刻影响并塑造了公众职

① 刘永林、金志峰、张晓彤:《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之探》,《中国行政管理》2021 年第 9 期。

②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③ Evetts J., “A new profession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urrent Sociology*, 59(4), 2011.

④ Adams T. L., Clegg S., Eyal G., et al., “Connective professionalism: Towards (yet another) ideal type,” *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 7 (2), 2020.

业信任的生成基础。

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缺少国内职业基础性统计数据，控制变量纳入美国的职业数据，但该类国外职业数据与我国职业知识、技能和教育要求仍存在龃龉，难以实现控制变量的作用；当前，国家数据局正在着力于开发公共数据资源^①，构建我国职业数据集，既有助于预测国内就业市场需求与供应关系，也有利于学术界对职业问题的研究。同时，囿于数据限制，本文暂时还未纳入中国职业教育相关变量，由于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进行增改，该趋势意味着职业教育对职业信任潜在的影响，未来有待收集职业教育相关数据进行验证。

由于职业信任可分为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本文亦对职业的道德信任进行了探索。首先，检验了职业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的关系，发现相关性系数较低，2018年和2021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409和0.233，这意味着职业的技术信任和道德信任确实存在差异，值得分别进行讨论。其次，通过将道德信任的语义向量量表设定为：诚实—欺骗、公正—歧视、仁慈—残酷、负责—失职，发现其克朗巴赫 α 系数和折半信度偏低（2018年和2021年分别为0.347、0.262和0.347和0.374），说明职业道德信任的测量建构在内部一致性上较差，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多维性。最后，还尝试考察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职业的“楷模化”宣传程度对职业道德信任的影响，发现官方媒体通过强化某些职业作为利他主义典范的角色，突出其服务公共利益以及非利益驱动的特性^②，确实能够显著提高公众对这些职业的道德信任。总之，职业道德信任的测量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其与技术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责任编辑：朱颖）

Difference, Boundaries, and Qualifications: A Threefold Relational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Trust

LI Manli, LI Jun

Abstract: Public trust in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their expertise i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social stability. As profess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broader social environment, the system of trust once underpinned by the “closure” of classical professions has been eroded, catalyzing a relational turn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This study develops a tripartite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mechanisms shaping public trust in occupations: relationships among occupations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system,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cupations and the market,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cupations and the state. Employing the Chinese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2022 edition) and the Tencent AI Lab Embedding Corpus,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public trust in occupational expertise of a comprehensive set of occupations. It investigates how occupational network structures, the public nature of occupations, and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of occupational governance shape such trust.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key insights. First, task jurisdictional similarity between occupations exhibi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echnical trust. Second, in an era of increasingly permeable knowledge boundaries, occupational groups that are client-independent and possess more abstract expertise are more likely to garner public trust. Finally, the study advances a localized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associational professionalism”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glo-American model, China regulates professional entry barriers through state-led qualification systems, which positively influences public trust in its occupational groups.

Key words: occupational trust, relational mechanisms, localization,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① 详见《国家数据局加快制定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配套政策》，网站地址：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79047.htm，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0日。

② Saks M., *Profess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Medical power, altruism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Routledge, 2005.